

# 族群地理與生態史學

## ——從「藏彝走廊」說起

• 徐新建

費孝通在80年代提出「藏彝走廊」的論說，其意義就在於突破「行政史觀」，亦即突破「僅從傳統的行政區劃看待中國社會歷史」的單一史觀。費先生指出，過去人們習慣於「一個省一個省地搞，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地搞」，看不見整體棋局上的族群關係。他認為中華民族所在的地域，從宏觀上至少可以分作包括「藏彝走廊」在內的十個部分。

有關「藏彝走廊」的論說，自人類學家費孝通在80年代提出<sup>①</sup>，到二十一世紀初歷史學家引入高校講義並在網上傳授<sup>②</sup>，直到後來再被自然科學家運用於對遠古人類遷徙往來的解釋<sup>③</sup>，二十多年來已成了學界日益關注的熱門議題。如今又有學者呼籲重舉前輩旗幟，在歷史和民族學研究的意義上將「藏彝走廊」從「西南民族地區」的舊框架中「剝離出來」，並使之與過去「橫斷山脈」、「六江流域」等提法相區別，用以「統一稱謂西藏東部和川滇西部」這個特定的「歷史—民族區域」，從而在整體視野上把對中國的民族研究引向深入<sup>④</sup>。

聯繫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此議題仍有繼續展開的必要。

### 一 對「行省史觀」的兼容和突破

以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學術環境來看，費孝通當年提出「藏

彝走廊」的突出意義，就在於對「行政史觀」的突破，亦即對「僅從傳統的行政區劃看待中國社會歷史」這種單一史觀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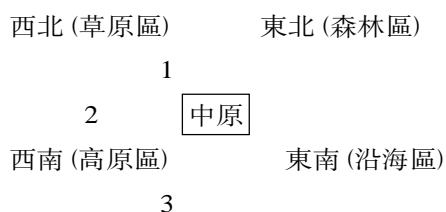
費孝通指出，以中國的民族研究為例，過去很難把問題了解清楚，原因之一就在於人們習慣於「一個省一個省地搞，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地搞」，看不見「全國一盤棋」，從而也看不見整體棋局上的族群關係<sup>⑤</sup>。針對這樣的局限，費孝通認為中華民族所在的地域，從宏觀上至少可以分作包括「藏彝走廊」在內的十個部分，亦即可概括為「六區—三廊—諸島」的總體格局<sup>⑥</sup>：

1. 中原地區
2. 北部草原地區
3. 東北角的高山森林地區
4. 西南角的青藏高原
5. 雲貴高原
6. 沿海地區
7. 西北走廊
8. 南嶺走廊
9. 藏彝走廊
10. 沿海諸島

而這個整體棋局的「棋盤」，就是費孝通後來在倡導「多元一體」說時所總結的「中國框架」：「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太平洋西岸諸島，北有廣漠，東南是海，西南是山」這一地理上自成單元的東亞地區，即如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範圍⑦。

這裏，所謂「地理上自成單元的東亞地區」，既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領土，亦指漫長歲月裏族群交往與王朝更替的歷史範圍。其中對大陸內的「六區三廊」劃分和命名，雖同時兼容了地貌、方位和行省、民族的範疇，但裏面沿用的行省名稱，如「雲貴」、「青藏」（高原）等，都並非強調傳統意義上的「行政單位」，而是相反，含有了更多的「跨行省」意味。與現今通行的行省區劃相比，「六區三廊」的圖式簡約了許多，其力求突出的是中華各族生存空間裏地貌與族群間的內在區分和歷史聯繫。

對此，若再作簡約的話，還可以劃出以「中原」為中心的五方圖式，而三個「走廊」地帶則穿插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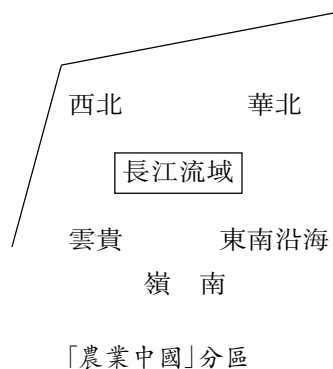


1. 「西北走廊」；2. 「藏彝走廊」；3. 「嶺南走廊」

正如後來學者指出的那樣，在費孝通的圖式裏，「走廊」的意義，在於為以往研究中國歷史時的單一「板塊」劃分格局，增添了具有連接與動態含義的「通道」類型，從而使認識中華各族間的漫長關聯有了空間上的交往框架和互動視野⑧。

近代以來，在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著述裏，也表現有對「行省史觀」

的超越，即在空間上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來認識中國。如人類學出身的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便從地方社會經濟輻射與聯繫的角度把農業中國分為八區：華北、西北、長江上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嶺南、雲貴⑨。如果合併其中的長江流域的話，可以簡約為如下圖式：



在施堅雅的圖式裏，突出着若干個區域性的中心與邊緣，但沒有「藏彝走廊」這樣的劃分；同時「北方草地」和「青藏高原」都不在其內。為甚麼呢？原因在於施堅雅所分析的範圍是「農業中國」及其區域體系中的「城鄉連續統一體」。

對於為何要採用與費氏圖式一致的「跨省」劃分，施堅雅解釋的理由是避免「省界」與「地文」相牴牾。他說，「即使是最接近一致的地方，——如四川同長江上游地區，兩廣同嶺南地區——也明顯地並不完全吻合」，而「有幾個省就跨越好幾個地區，最明顯的例子是陝西、山西、安徽、江蘇和貴州」。施堅雅認為，從整體上看，中華帝國晚期的空間格局，僅就城市區域而言，並不表現為單獨的一體化體系，而是「構成好幾個地區體系」，並且「地區之間只有脆弱的聯繫」。因此只有分別地對這些地區加以分析、比較，才能夠認識作為整體的國家（農區）⑩。

近代以來，在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著述裏，也表現有對「行省史觀」的超越，即在空間上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來認識中國。如人類學出身的施堅雅便從地方社會經濟輻射與聯繫的角度把農業中國分為八區。施堅雅認為，從整體上看，中華帝國晚期的空間格局，僅就城市區域而言，並不表現為單獨的一體化體系，而是「構成好幾個地區體系」，並且「地區之間只有脆弱的聯繫」。

作為重要的國家政治手段，中國古代行政區劃的原則主要有二，即「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前者尊重自然特徵，後者突出統治需求。元代統治者為了防止分裂割據現象的發生而採用犬牙相入的原則，一反過去漢州、唐道、宋路的劃分方法，無視歷來最重要的幾條山川邊界——秦嶺、淮河、南嶺、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個行省都不能成為完整的形勝之區。

值得提出的是，在施堅雅早於費孝通而提出的地區圖式裏（施堅雅著作的英文版於1977年問世），已經含有「走廊」類型。比如他就把長江中游地區進一步分成了「走廊地區」和「支流盆地」，並以此分析武漢在「長江走廊」乃至整個長江中游地區的中心作用。與主要處在橫斷山脈峽谷地帶的「藏彝走廊」不同，長江中游地區的「走廊」當屬「水道」類型；而在「中華棋盤」的整體格局上，二者的地位以及對族群交往所起的功能等顯然有別。不過可以看出的是，費孝通對中華各族所處範圍內「板塊」與「通道」的類型劃分，其實並非孤說，其一方面可以在國內外其他學者的論述裏找到近似的提法或回應，另一方面證明彼此都還有進一步商榷、互補的餘地。但無論如何，這種因兼容並突破「行省史觀」而在視野和方法上對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所作的時代貢獻，顯然功不可沒。

擴展來看，就像在研討國際事務時大多把「國家」作為主要的劃分單位那樣，審視國情而偏於僅以「行省」為基本對象，是現代國人普遍採用並習以為常的做法。這有利也有弊。甚麼是「省」呢？在中國的傳統中，「省」實際是中央政權為了治國而人為設置的行政單位。比起相對恆穩的地文構成來說，這種工具式的人為單位具有更多的「變動無常」性。

對「省」的設置，金、元是轉折點。忽必烈「入主中原」後，「將蒙古初年沿用金後期的行省制度推行於全國」，並在王朝演變的過程中根據統治需要而逐漸把「省」的地位和作用從原來的「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演變成為「常設的最高地方政府」<sup>⑩</sup>。「行省」的全稱是「行中書省」，最初就是指「臨時性的中央派出機構」。到元英宗

至治時，在全國五級制（省、路、府、州、縣）的行政區劃中，設有一個「中書省」（也稱「都省」）總理全國政務，另設十一個「行中書省」處理地方事務，長官稱作「丞相」。其中陝西和四川兩省的設置沿革，就頗體現出因人為需要而不斷更替的「工具」特徵。《元史》記載說：「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在中統元年時，還「以商挺領秦蜀五路四川行省事」，至中統三年，卻「改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而「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在國初時，其地「總於陝西」，至元十八年，則「以陝西行中書分省四川」；到了二十三年，又「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統有九路、五府」。

依照今日學者的看法，作為重要的國家政治手段，中國古代行政區劃的原則主要有二，即「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前者尊重自然特徵，後者突出統治需求。到元代時，統治者認為「為了防止分裂割據現象的發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則」，因而「完全一反過去漢州、唐道、宋路的劃分方法，無視歷來最重要的幾條山川邊界——秦嶺、淮河、南嶺、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個行省都不能成為完整的形勝之區」<sup>⑪</sup>。對此，清人儲大文批評說：「元代分省建置，惟務侈闊，盡廢《禹貢》分州、唐宋分道之舊。……漢中隸秦，歸州隸楚，又合內江、外江為一，而蜀之險失。」<sup>⑫</sup>

「州郡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照理說來「山川形便」的原則更符合治理農業大國的需要，但「犬牙相入」的區劃格局卻在實際上日趨主導。這說明了甚麼呢？歷史地理學家周振鶴認為，其「反映了中央對地方控制愈來愈緊，中央集權程度愈來愈加強的事實」<sup>⑬</sup>。

具體說來，明清兩朝對元代「行省制度」的沿用各有不同。明洪武九年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司」，但流俗仍稱省；十三年罷「中書省」。至明鼎盛時期的行政格局為「兩京十三司」，總稱十五省。清朝的行省區劃多「因明舊」，同時又將湖廣、陝西等省一分為多，並在清的發祥地設「將軍轄區」，在蒙古、青藏等地設「大臣轄區」，從而逐漸形成與明代不同的「內地十八省」與其他多處「轄區」並置分屬的統治格局<sup>⑥</sup>。

可見，從元時的十一、到明代的十五、到清代的十八，直到當今「海南建省」、「重慶直轄」之後的三十以來，在中華各族所處的文化空間裏，「省」作為分析審視的單位是多麼的變動不定。若僅以此為坐標和對象，而不加上時代說明並附以其他空間尺度，卻來談論諸如「四川文化」、「陝西經濟」或「貴州民族」一類的議題，其局限和弊端是難以免除的。因此，提出「藏彝走廊」等類型劃分的貢獻，就在於對「行省史觀」的兼容和突破。其意義在於幫助人們從行省之外的別樣角度看中國。

## 二 對「族群地理」的使用和闡發

在我看來，研討中國歷史文化時，能夠從空間框架上突破「行省史觀」的另一種參照是「族群地理」。其體現之一便是「民族走廊」這樣的類型劃分。

按民族學家李紹明的解釋，「民族走廊」是結合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含義後的命名；在中國歷史文化中，能夠被稱為「民族走廊」的地方至少有兩

處，一處以「河西走廊」為依託，一處位於橫斷山脈區域（或「六江流域」）<sup>⑦</sup>；前者可以叫做「西北民族走廊」，後者則因特徵是「其中所居藏語支諸民族為多」，故可稱為「藏彝走廊」<sup>⑧</sup>。

對於「藏彝走廊」的指涉範圍，目前學界還有爭論。但根據人們基本同意的看法，其大致是一條「以康定為中心」向北和向南延伸的狹長地帶、分屬在甘、青、川、藏、滇諸省區邊境。對此，若只從行省區劃的框架來認識的話，不僅難以準確把握，反易導致支離破碎感；而如果換用「族群地理」的格局來看待，則會有所助益。須要指出的是，雖與政府設定的行省單位明顯有別，「民族走廊」的提法仍屬人為區劃之類型。正如費孝通當時所做的說明那樣：為了幫助弄清楚該地區的民族演變過程，我們（需要並可以）「劃出一條走廊」<sup>⑨</sup>。

迄今為止，有關「藏彝走廊」的這種劃分，人們的關注點集中在通道意義、地文表述和族群名稱與族群關係幾個方面。

這裏重點討論「族群關係」。首先應看到所謂「走廊」的稱謂採用的是比喻手法，突出着其與別的「板塊」比較時的「狹長地帶」特徵。可如若就此過份強調「走廊」內各族群的遷移與流動而忽略他們的世居傳承，則有將此區域內長期以來眾多族群的家園及生活「抽空」的危險。如今在岷江中上游大量發現的石棺葬等遺址表明，千百年來，這裏早已是若干族群生於斯、葬於斯、並且同樣呈現過包含「衣食住行」、「悲歡離合」內容的故鄉。對此，有學者曾以「橫斷山文明」一類的判斷加以過評述。因此我認為若加以限制，「通道」象徵的濫用無疑會導致在「族群地理」的劃分中，對「板塊」

「民族走廊」是結合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含義後的命名；在中國歷史文化中，能夠被稱為「民族走廊」的地方至少有兩處，一是「西北民族走廊」，一是「藏彝走廊」。後者大致是指「以康定為中心」向北和向南延伸的狹長地帶、分屬在甘、青、川、藏、滇諸省區邊境。提出「藏彝走廊」等類型劃分，其意義在於幫助人們從行省之外的別樣角度看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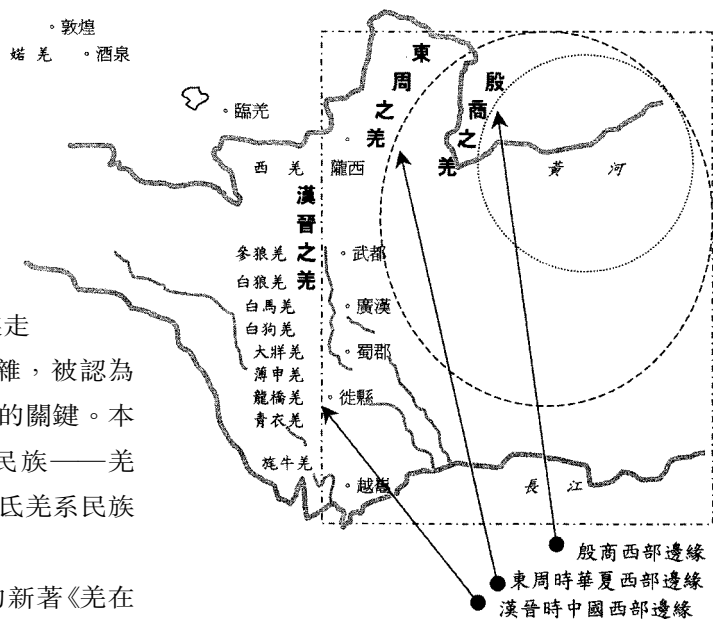
類型的偏重和對「走廊」類型的看輕，以及對身處後者之中、堪稱「弱勢」的族群及其文化之忽略。

展開來看，華夷各族世代生存和交往的空間，在族群地理的意義上，經歷了豐富多樣的譜寫和演變；時至晚清和民國，則形成從腹地到邊疆的族群「共和」局面<sup>19</sup>。二十世紀50年代以後，隨着周邊國界的劃定以及國內「民族自治區域」的設置，中國的族群地理格局又有所變化。若以「板塊」和「走廊」兩種類型的對照、呼應來看，除了始終作為主幹存在的「漢區」之外，在「藏彝走廊」周圍呈現的便有藏區、回區、彝區和壯區等。它們被劃定在省（區）、市、縣和鄉等不同級別的各地行政區劃之中。如今人們把處在橫斷山脈地帶的「藏彝走廊」從行政區劃中剝離出來，視為可以單獨存在的區域，與其說整合了以往行省區劃裏的零散「部件」，不如說更凸顯了整體中的族群關聯。一些體質人類學家經過考察分析後提出，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特徵分為三類，「藏彝走廊類型」是其中之一，而「生活在藏彝走廊內的藏緬語族各族具有共同的體質特徵，這指示他們具有共同的族源——古羌人」<sup>20</sup>。

「青藏高原東緣『民族走廊』因其間民族與文化複雜，被認為是解答中國民族歷史之謎的關鍵。本書以民族走廊上一關鍵民族——羌族，來說明漢、藏與西南氏羌系民族『邊緣』的形成過程。」

以上是引自王明珂的新著《羌在漢藏之間》封底「內容介紹」的一段文字。該書討論的內容即與「藏彝走廊」有關，而作者對此區域的界定是「在

漢、藏之間」，強調變動中的族群關係。王明珂把這一區域裏的羌族作為變遷着的「地理人群」來分析，指出一種逐步形成於其他族群之間的「邊緣」特徵，即南有彝族、西是藏族、東方「則是更廣大的十二億漢族」；這樣，對此區域內族群關係的審視和書寫，就同時成為「漢族西方族群邊緣的歷史」和「藏族的東方族群邊緣歷史」以及「彝族或『西南氏羌系民族』之北方族群邊緣的歷史」的交匯整合<sup>21</sup>。在這裏，王明珂其實是把西方人類學家巴斯 (Fredrik Barth) 等的族群邊界理論同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有關事例結合，對變動中的「漢與非漢」（華夏與氏羌）關係作了可稱為「族際過程」式的生動勾勒。在這樣的勾勒中，人們看到的既非孤立自在的地文區域，亦不是分割支解的行政單位，而是同時具有「族群中心」與「族群邊緣」雙重視點的族群聯繫。根據該書的圖式，以自商至漢晉的「華夏視點」為例，這種依次移動的「族際過程」即表現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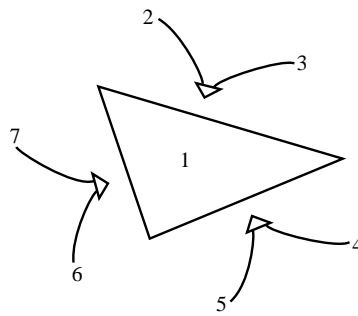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76。

一些體質人類學家經過考察分析後提出，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特徵分為三類，「藏彝走廊類型」是其中之一，「他們具有共同的族源——古羌人」。王明珂把這一區域裏的羌族作為變遷着的「地理人群」來分析，對變動中的「漢與非漢」（華夏與氏羌）關係作了可稱為「族際過程」式的生動勾勒。

值得引申討論的是，針對王明珂勾勒的「漢」與「非漢」自西向東式的「族際過程」，李亦園作了重要補充，把所謂「漢藏之間」的區域特徵進一步闡發為「族群緩衝地帶」，認為生活在該地帶像羌族這樣的弱小族群，實際上擔當着夾在漢、藏兩族之間的緩衝作用。順着此思路，李亦園加以了展開，把審視的空間移至嶺南，然後設問道：為甚麼同樣被認為是夏后氏或禹王之後的「越人」，會在歷史中分散為許多群體的所謂「百越」？這是否是由於在南方沒有一個較強大的藏族存在之故<sup>22</sup>？顯然，這樣的思考、論述，又從族群地理的角度，把對華夷各族生存環境及互動關係的研究引向了更為深入的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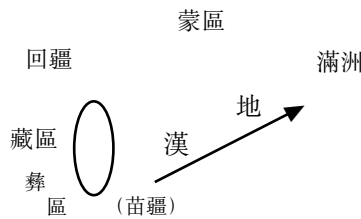
在我看來，與其早期的《華夏邊緣》<sup>23</sup>相比，王明珂新著《羌在漢藏之間》的最大改進，就是為觀察「岷江中上游」地區的羌人地帶增添了西部「藏區」和南部「彝區」，從而有助於突破以往單向的東面「漢地」視點限制，見到更為完整和立體的多重「邊緣」；而所謂「羌人地帶」式的強調，則使被「藏彝走廊」這樣的簡化命名遮蔽的弱小族群得到提示和凸顯。不過從作為整體的華夷各族交往空間看，「羌人地帶」也罷，「藏彝走廊」也罷，都只是局部。放大開來，還應審視宏觀層面的族群關聯。比如對於「藏彝走廊」所處的整個「西南地區」，我曾作過使之與周邊多方相連的探討，並把它的區位特徵描述為「多通道」和「大三角」。

下圖「三角地」的上下橫線代表「東西走向」的兩江流域，西面斜線表示「南北走向」的六江地區或「橫斷山脈地帶」。所謂「藏彝走廊」即處在後者範圍。也就是說，除了與漢、藏、彝等的交錯外，這一地區的下角還受到東南亞半島和印度次大陸的關聯影響。



說明：1，西南三角地；2，黃河上游地區(西北)；3，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原)；4，長江中下游地區(南方文化帶東部)；5，珠江流域(南方文化帶中部)；6，東南亞半島；7，印度次大陸。  
資料來源：徐新建：《西南研究論》(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頁147。

如果再以晚清至民國時簡化了的華夷圖式來看，以所謂「五族共和」為其大勢的族群地理亦告示着影響至今的疆域格局：



說明：圖中長圓即表示今人所謂「藏彝走廊」的大致位置

在當時的國勢下，「五族共和」的提出實際是在族群地理意義上對「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舊式口號的揚棄，以及在新的國際背景裏對華夷關聯之「五大疆域」的再次整合。

總之，概括來說，族群地理意義上的「藏彝走廊」，其所具有的區位特徵和歷史意義，遠非簡單的「通道」名稱所能代表。就我個人的初步理解而言，其至少可以表述為如下方面：

1. 古「橫斷山文明」地區；
2. 氐羌族群的家園之一；
3. 華夏及其邊緣族群的互動地帶；
4. 藏語支諸民族的遷移通道；
5. 漢、藏民族的緩衝地帶；
6. 現代「多元一體」之中國的「內部邊疆」。

李亦園把所謂「漢藏之間」的區域特徵進一步闡發為「族群緩衝地帶」，認為生活在該地帶像羌族這樣的弱小族群，實際上擔當着夾在漢、藏兩族之間的緩衝作用。順着此思路，李亦園問道：為甚麼「越人」會在歷史中分散為所謂「百越」？這是否是由於在南方沒有一個較強大的藏族存在之故？顯然，這種思考是從族群地理的角度，把對華夷各族生存環境及互動關係的研究引向了更為深入的層面。

可見，該地帶的族群地理內涵是多麼的豐富多樣，包括了從「氐羌故地」、「華夏邊緣」、「藏彝通道」到「漢藏之間」和「內部邊疆」等若干有待研討的特徵。至於最後的所謂「內部邊疆」說，提出者是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等西方人士。由此便引出了關於「生態史學」的議題。

### 三 對「生態史學」的期待和探討

前面提到施堅雅圖式的分區限於晚清時期的「農業中國」。若以與之對應的標準來看，被其省略的部分可以叫做「牧業中國」。而依照這樣的標準來展開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我以為即可稱為「生態史學」。這就是說，從生態史學的視點考察，時至晚清和民國綿延在漢、滿、蒙、回、藏等族群地理之間的疆域邊界，如果由東北向西南連起來看，其實體現的是東亞大陸支撐「農」與「牧」兩種主要文明的地文分野<sup>26</sup>。面對這既基本又緊要的邊界，由於各自起點和歸屬的不同，古往今來引出的是相去甚遠的看法和評價，有時甚至還帶有對立的敵視與怨懟。據現代的地理學者分析，大體說來，對於這同一條地文分界，生活在南方的人們要比北面的族群表現出更多的悲情成分——原因不在別處，就在前者自身「以南方農業社會為本位的立場」。正是這立場和這「悲情」，促使以農為本的南方社會不辭艱辛地沿着分界修築長城，從族群、政治、經濟和軍事諸方面構造了一條影響深遠的「長城地帶」<sup>27</sup>。

到了二十世紀，中國國門打開，美國地理學家拉鐵摩爾來到此分界地區，考察長城沿線。他以「局外人」的

眼光重新審視，發現「長城地帶」其實各以兩邊為腹地：對胡人或漢人分別是邊緣的長城，「對整個的亞洲內陸卻是一個中心」；在長城的兩側，「並立着農業與游牧兩大社會實體」；如果要稱「邊疆」的話，其應視為亞洲的「內陸邊疆」。六十多年後，唐曉峰以「長城內外是故鄉」為題，對拉鐵摩爾的「長城中心說」給予了很高評價，並指出此處所說的邊疆形態「包括巨大的自然差別和社會差別」，「是古代世界特有的歷史地理形態」<sup>28</sup>。

汪暉則強調拉氏觀點的意義，在於對中國唐宋以前歷史敘述的糾偏，即把以往「基本上是以長安和黃河為中心」或「以江南、運河為中心」的敘述範式，改為視長城為亞洲的中心，並將其看成「兩邊交往和民族融合的区域」，從而催生了「亞洲大陸內部的整體關係」。此外汪暉還對與之相關的邊疆問題加以分析，肯定了拉氏的另一個重要觀點，即：「游牧民族最開始是農耕社會中被排斥到草原上的那部分人，只有當他們真正成為一個草原社會的時候，兩個不同的社會所共有的邊疆才建立起來。」<sup>29</sup>

韓毓海也認為拉鐵摩爾的論述「包含了深刻的歷史洞見」。他說拉氏的一個重要結論是：正是以長城為核心的南北融合制度、特別是中原向東北的移民，解決了中國內地的資源和人口壓力，長城內外的生產、交換活動，其實就是維繫中華文明繁榮昌盛的基本制度框架。韓毓海所發揮的看法是<sup>30</sup>：

從更長遠來看，南北融合，混一天下的政治制度，為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中特別是：一個統一的帝國版圖，使得長城內外成為我們的故鄉，通過人口在南北的自然流

美國地理學家拉鐵摩爾發現，「長城地帶」其實是各以兩邊為腹地：對胡人或漢人分別是邊緣的長城，「對整個的亞洲內陸卻是一個中心」；在長城的兩側，「並立着農業與游牧兩大社會實體」；如果要稱「邊疆」的話，其應視為亞洲的「內陸邊疆」。六十多年後，唐曉峰指出此處所說的邊疆形態「包括巨大的自然差別和社會差別」，「是古代世界特有的歷史地理形態」。

動，更是解決了中原地區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

需要指出的是，在與「長城地帶」相關的生態話題裏，有一個曾引起廣泛關注的提法，即「十五英寸等降雨線」。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中國大歷史》一書裏，也特闢「土壤、風向和雨量」一章對之加以論述。黃先向讀者介紹說：「這線從中國東北向西南，當中的一段與長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則使青海與西藏和中國本部分隔。」繼而又指出：「這等雨線之東南，平均每年至少十五英寸的雨量是常態，符合拉鐵摩爾所說『中原農業茂盛，人口繁殖』。」<sup>29</sup>而在大致沿着這條等降雨線地段，今天的地理學家劃出了主要位於西部的「草原中國」。不過依我淺見，如與對「藏彝走廊」的討論相聯繫的話，迄今把「族群地理」與「生態史學」兩個方面成功結合的範例，是考古學家童恩正於80年代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帶」之說。根據海拔、地貌、氣候、降水和土壤、植被等多個方面的「相當一致性」，童恩正認為在中華版圖的整體框架裏，存在着一條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帶。這條地帶，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一直是畜牧或半農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場所」。它既是歷史上華、戎集團的文明分野，同時又是後一集團諸族群彼此交往、互滲的文化傳播帶。由於此地帶兩邊的農耕與游牧集團在環境與心態方面的不均衡，還導致了對雙方都有深刻影響的歷史後果。具體來說，即<sup>30</sup>：

正是由於華夏族這種源遠流長的心理上的凝聚力和 cultural 上的排他性，就促使北方和西方的邊地民族的文化傳

播，始終不能縱貫中華大地，而只能圍繞其邊緣進行。

按照作者的描繪，作為局部的「藏彝走廊」已同一個由東北至西南的更大地帶聯繫了起來。並且，童恩正不僅指出該地帶對夷、羌、戎、胡諸游牧族群的生存價值和「通道」作用，而且也暗示了它在整個農、牧集團對峙格局之間的「過渡」與「緩衝」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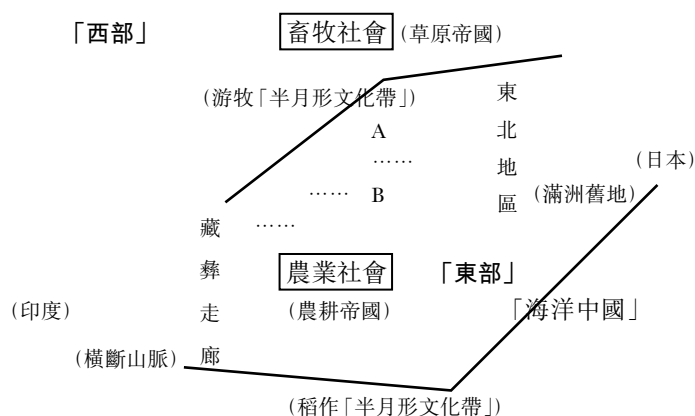
與此相關，在大致以這條自東北向西南萬里延伸之「半月形文化帶」為界的地方，自然地理研究者在50年代就提出過在區劃上把中國分成東、西兩個部分的主張<sup>31</sup>。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們習慣於從生態和文化的交錯特徵上，把東亞大陸簡化成農、牧兩大類型與分野的時候，其實即使對於作為農業社會的「東部」而言，也不應忽略其中的自然和文化差異。比如正是在所謂的農耕文化區的範圍內，日本的一些現代學者，如佐佐木高明等，就從地理、氣候及物產諸方面出發，總結出另外一條自喜馬拉雅山南麓、沿緬甸、雲南南部、泰國和越南北部，然後經長江南岸直至日本西部的「半月形文化帶」。其按自然植被特徵可稱為「照葉樹林帶」，而按農耕種植特點則可叫做「稻作文化帶」或「東亞半月弧稻作文化圈」<sup>32</sup>。

而聯繫族群分布的歷史情況，按如今民族學界的通常說法，這一地帶的世居往來者卻是與「氐羌」系統不同的另一人群：「百越」。有人認為：從遠古的「百越族群」先民的遷徙活動地域，到現在的傣族定居地區，都是在中國境內以及同周邊國家接壤的邊疆，從未超出「東亞半月弧稻作文化圈」自然地理帶範圍<sup>33</sup>。

考古學家童恩正認為在中華版圖裏，存在着一條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帶。它既是歷史上華、戎集團的文明分野，同時又是後一集團諸族群彼此交往、互滲的文化傳播帶。一些現代日本學者則總結出另外一條自喜馬拉雅山南麓、沿緬甸、雲南南部、泰國和越南北部，然後經長江南岸直至日本西部的「半月形文化帶」，這一地帶的世居往來者是與「氐羌」系統不同的另一人群：「百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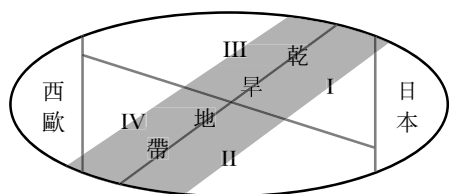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若把上述兩條不同的「半月形文化帶」與農、牧社會的各自「中心」與「邊緣」聯繫起來、且上下對稱地並置在東亞大陸的生態格局中，將呈現出一幅更為「有機」的整體框架；由此可幫助我們認識此區域內的地理、族群和文化與歷史：



說明：虛線「……」表示農耕社會內部的麥作與稻作分界；A代表北方麥作區；B代表南方稻作區。

梅棹忠夫把西歐和日本稱為「第一類地區」，而「第二類地區」則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地中海、伊斯蘭世界四個文明圈。在他看來，這個由東北向西南斜跨大陸的乾旱地帶「是惡魔之巢，是破壞之源」。從梅氏對日本和西歐的同構及「生態優勢」的讚頌，強調一、二地區的差別，不難看出其與近代日本「脫亞入歐」意識的關聯和呼應。

如果跨越東亞範圍，以「生態史學」的視野考察歐亞大區間的聯繫，值得提及的另一重要論說是梅棹忠夫及其「文明的生態史觀」。梅氏論說被稱為一種「關於舊世界各大文明歷史演變的理論」。其把包括亞洲、歐洲以及北非，從生態地理的意義上看作一個整體，即「現代以前人類歷史的大舞台」。他進而又將此所謂的「舊世界」畫成一個扁形的橢圓，把位於左右兩端的西歐和日本稱為「第一類地區」，其內側稱為「第二類地區」<sup>④</sup>：



資料來源：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譯：《文明的生態史觀》(上海：三聯書店，1988)，頁153。

在梅棹忠夫的圖式中，「第二地區」包括了四個文明圈，即 (I) 中國世界，(II) 印度世界，(III) 俄羅斯世界和 (IV) 地中海、伊斯蘭世界。它們的特點是「都具有巨大的帝國及其周圍的藩屬國所形成的構造」<sup>⑤</sup>。而從生態與文明的互動結果觀察，梅氏劃分出的所謂「第二地區」核心部分，是「由東北向西南斜跨大陸的乾旱地帶」。在他看來，這裏「是惡魔之巢，是破壞之源」；因為「由這裏發起，自古以來反覆出現的游牧民族等殘虐至極的暴力運動，破壞了其周圍的文明世界」。作為與此不同的對照，梅氏接着對日本和西歐的「生態優勢」予以了讚頌，稱「第一區距暴力之源較遠，在破壞中得到保存，在中緯度溫帶優越的自然條件下，如同在溫室中那樣，得以舒適平和地生長」<sup>⑥</sup>。由此，梅棹忠夫強調了一、二地區的差別以及日本與西歐的同構。從中不難看出其與近代以來在日本漸成主流的「脫亞入歐」意識的關聯和呼應<sup>⑦</sup>。關於後一層面的話題當然值得認真對待，不過基於本文的主題考慮，這裏僅着重在梅氏提出的「文明生態史觀」範圍。

從「藏彝走廊」這樣的論題來看，梅氏論說的參照意義在於其提出的一個超越東亞局限的更大空間；其中，自然生態的差異及關聯對各文明世界的歷史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今有學者認為梅氏的理論是為回應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的「挑戰」而做出的創立，但比湯因比「深刻得多，也規整得多」<sup>⑧</sup>。

那麼湯因比的看法如何呢？在與此相關的論題裏，湯因比也論述了歐亞大陸的整體性以及橫貫其間的農、牧分界——大草原和大沙漠。不過，他一方面所強調的是：「在歐亞大陸

的游牧民族與他們過定居生活的鄰居之間的邊境戰爭，在這場戰爭中，農耕居民明顯希望贏得最後的勝利」；另一方面卻又能在正視「游牧民只要衝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們在軍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這種所謂「蠻族」威脅的同時，肯定游牧生活方式對該地區生態環境的適應和維護。由此湯因比得出了從生態出發的結論：「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開發大自然，卻又不把它變為不毛之地。」<sup>⑨</sup>

作為碩果纍纍的史學大家，湯氏在以《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命名的最後著作中，貫穿了其一貫的整體史觀，並特別強調了人與自然在生物圈意義上的彼此關聯。在他為讀者勾畫的歐亞圖式裏，文明不僅是多元的，而且各有其不同的生態背景，呈現出交錯依存的景象。

然而湯因比並不滿足於僅僅對不同文明的發展史作客觀描繪，而是向人們發出了以「生物圈」為起點和歸宿的呼籲：

如果我們確實認識到，迄今一直是我們唯一棲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將永遠是我們唯一的棲身之地，這種認識就會告誡我們，把我們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這個生物圈上，考察它的歷史，預測它的未來，盡一切努力保證這唯一的生物圈永遠作為人類的棲身之處，直到人類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變成一個不能棲身的地方。

面對此種眼界與胸懷，在「中國文化」這樣的國別研究領域裏，倡導一點「族群地理」與「生態史學」的視角和方法，我想當有必要吧。

## 註釋

①⑩ 參見費孝通：〈關於我國的民族識別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

② 李孝聰：〈區域歷史地理教學參考大綱〉，北京大學歷史系網站：[www.hist.pku.edu.cn/person/lixiacong/lxc1.htm](http://www.hist.pku.edu.cn/person/lixiacong/lxc1.htm)。

③ 〈印證東亞人群起源非洲說〉，新華社上海4月6日電，轉引自《深圳商報》，2003年4月7日；〈漢藏語系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可能是三萬年前的氏羌氏族〉。

④⑧ 參見石碩：〈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與區域〉，「藏彝走廊歷史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2003年10月·成都(打印稿)。

⑤ 費孝通：〈談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

⑥ 費孝通對「全國一盤棋」格局大陸部分的劃分最早是「八個地區」，後來加上「西北走廊」成為九個。我將其歸納為「六區三廊」格局；若再加上島嶼部分的話，可補充稱為「六區三廊諸島」格局。參見費孝通：〈民族社會學調查的嘗試〉，載氏著：《從事社會學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頁91；〈談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

⑦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頁2-3。

⑨⑩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45；242-50。

⑪⑬ 參見譚其驤主編：《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頁59；67-68。

⑫⑭ 周振鶴：《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108-135；112-13。

⑮ 轉引自上書，頁128。

⑯ 李紹明：〈西南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載《中國西南的古代交通與文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頁37-38。此處的「六江流域」的六江指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

史學大家湯因比曾呼籲：「迄今一直是我們唯一棲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將永遠是我們唯一的棲身之地，這種認識就會告誡我們，把我們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這個生物圈上，……盡一切努力保證這唯一的生物圈永遠作為人類的棲身之處。」用此種眼界與胸懷，在「中國文化」這樣的國別研究領域裏，倡導一點「族群地理」與「生態史學」的視角和方法，我想是很有必要的吧。

⑰ 李紹明：〈再談民族走廊〉，「藏彝走廊歷史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2003年10月·成都(打印稿)。

⑱ 參見徐新建：〈從邊疆到腹地：中國多元民族的不同類型——兼論「多元一體」格局〉，《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6期。

⑲ 參見胡興宇等：〈中國33個少數民族體質特徵的比較研究〉，載陳國強等主編：《中國人類學的發展》(上海：三聯書店，1996)，頁265-76。

⑳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前言」，頁xi-xviii；第六章「羌族史的再建構：華夏邊緣觀點」，頁175。

㉑ 李亦園：〈序《羌在漢藏之間》〉，載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頁i-viii；又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㉒ 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㉓ 需要說明的是，在看待東亞大陸所謂農、牧「兩大類型」的劃分上，不可過於絕對。因為那樣一來容易導致對一個複雜區域的簡單化，從而忽略其他豐富類型的存在。對此筆者曾有論述，可參閱註⑱〈從邊疆到腹地〉。

㉔ 參見唐曉峰：〈長城內外是故鄉〉，《讀書》，1998年第4期。

㉕ 參見同上。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作的英文名稱是*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譯本有的叫《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有的為《內亞洲的中國邊疆》；意思略有差異。

㉖ 汪暉：〈亞洲想像的歷史條件〉，此文為作者於2001年12月28日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雙周學術討論會」上做的演講整理稿。參見「世紀中國」網頁([www.cc.org.cn/old/wencui/020422200/0204222017.htm](http://www.cc.org.cn/old/wencui/020422200/0204222017.htm))。

㉗ 韓毓海：〈自遠方〉，參見「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culture.online.sh.cn/bbs/read.asp?boardid=1&bbsid=25201>)。

㉘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21-27。

㉙ 董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載

《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36。

㉚ 參見西北師範學院地理系、地圖出版社主編：《中國自然地理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4)。該圖集介紹說，在1978年4月的國內綜合大學地理系教材統編會上，學者們「以非地帶性諸因素為主要根據」，並「兼顧各地帶性因素諸特徵」，將全國分為兩大區域，即「中國東部」和「中國西部」。參見該著，頁94。

㉛ 佐佐木高明著，劉愚山譯：《照葉樹林文化之路——從不丹、雲南至日本》(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

㉜ 參見「雲南信息港」：[http://travel.yn.cninfo.net/news/5/01-7-4/news\\_1610\\_0.html](http://travel.yn.cninfo.net/news/5/01-7-4/news_1610_0.html)。

㉝ 參見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譯：《文明的生態史觀》(上海：三聯書店，1988)。

㉞ 同上書，頁154。

㉟ 關於日本的「脫亞入歐」意識，自「明治維新」時代就有福澤諭吉等人提出並產生過影響；二十世紀80年代又被重新翻檢出來，從而引起各界關注。參見長谷川慶太郎著，鮑剛等譯：《別了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不過，汪暉認為日本早期思想界所謂「脫亞入歐」觀念中的亞洲和歐洲，不單純是一個地理的範疇而是一個文明的概念——因為人們「不能把日本搬到歐洲去」。因此，「脫亞的實質在於脫儒教主義」(見〈亞洲想像的歷史條件〉)。由此對照梅棹忠夫的「日本—西歐」第一區之說，可視為是從地理生態學的角度對早期「脫亞入歐」主張的回應和發展。其含義暗示的「科學」理據是：不用從地理上把日本搬入歐洲，因為二者在歐亞文明生態圈的「兩極」本來就屬同構，是舊世界的「第一區」。

㊱ 朱海軍：〈據「文明的生態史觀」論中國古代文明〉，參見《西湖評論》，第0082期([www.jw-dns.com](http://www.jw-dns.com))。

㊲ 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著，徐波等譯，馬小軍校：《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77-79。

徐新建 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文化人類學和比較文學研究。